

Column

■不足为奇

女王陛下政府打响“追薪”第一枪



蒋玉磊 制图

■知无不言

中国步入消费率加快回升通道

人们可以举出很多导致过去30年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因素,但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工业化、产权改革、分配机制和人口结构变化三个方面。然而,从展望未来,也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着中国将经历消费率逐渐上升、储蓄率逐步下降的过程。中国工业化已达到中期阶段甚至中后期阶段,日益广泛并加速的产权改革,将会使越来越多人逐渐扩大财产性收入的份额,而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正使全社会大规模养老性消费支出陡增。

为了为了提高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主导性,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之需,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起,新增社会收入更多更快地向政府集中,这都使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受到削弱。另外,“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中国人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家庭也骤然小型化,连同缺失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起,使得“储蓄养老”代替了传统的“养儿防老”,进而助长了储蓄率的提高,也缩减了家庭部门相对其收入的消费开支率。

然而,从现在展望未来,也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着中国将经历消费率逐渐上升、储蓄率逐步下降的过程。

虽然距完成工业化目标还有一段路,但有关中国工业化已达到中期阶段甚至中后期阶段的判断,还是有历史和现实依据的。这可以从发达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有机构成、人均收入水平、资本与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变动中看得出,也可从中国现实经济世界观察到。而历史昭示,一旦工业化达到或越过中期阶段,投资的增长速度将趋于下降,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相对份额趋于稳定,而服务业增长加速,消费市场变得活跃,消费率在储蓄率下降的过程中迎来回升。

尽管中国的产权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无论是农村土地制度,还是国有企业股权制度,也不管是从人们的意识形态上看,还是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以拥有全部或部分财产权的产权改革推进,已经深入到各种竞争性和市场化领域。日益广泛并加速的产权改革,也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拥有财产的同时,逐渐扩大财产性收入的份额。这无疑会使越来越多的人的收入更加多元和稳定。这意味着消费能力的增强,消费支出水平的不断增长。

当然,已变得相当突出的扭曲的社会分配机制,阻碍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优化,并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对此,全社会已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虽然利益格局的改变,分配机制的调整,从来都是最困难的,但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了维护社会持久的稳定,政府自始至终都在坚持调整和优化分配结构的政策,在税收制度、财政支出制度、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国有经营性股权收益分配制度等方面,已经做出并将继续做出一些可能的调整。这些调整,在可预期的将来,在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增长的相对格局中,会产生一些对居民收入的补偿性增长效果。尤其通过政府财政主导的社会保障投入的增加,应该会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进展。这些调整和进展,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率,无疑是有帮助的。

再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高峰时代即将过去,也使得储蓄率不再进一步增加,消费率不再进一步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集中性大规模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致使全社会依靠原有储蓄的大规模养老性消费支出陡增。这意味着,一方面新增储蓄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原有储蓄不是被用于投资,而是被不断提出来消费。加之,中国城市化在今后一段时期必将加速推进,也使消费特别是服务性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如此一来,焉有消费率不上升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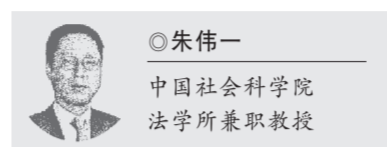
可见,即便没有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由储蓄率不断上升转向消费率不断上升,也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只不过,这次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转变。

“追讨”(clawback)是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指如果事后发现,金融机构雇员的业绩并未实现,那么金融机构有权追回雇员的部分薪酬。瑞士信贷、瑞银和摩根士丹利已将此引入了其薪酬机制。但类似的条款只适用于未来的问题。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只有英国政府要求银行高管退出其已经得到的收入——有刑事责任的另说。倒霉的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前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爵士,就成了英国政府讨薪对象。

唐宁街也是急了。政府是RBS的大股东,占有其70%的股份。今年2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拟再对RBS注资255亿英镑(合365亿美元)。这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此前RBS表示,去年亏损344亿美元。古德温先生却仍然优哉游哉,每年拿65万英镑退休金,可以一直拿到他离开人世为止。

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表示,政府对退休金一事必须再议。他先派了位部级官员去见古德温,好言好语,劝他少拿些钱。古德温不理。达林只好来硬的,通过BBC电台,直接向民众呼吁:现在这个样子,RBS前CEO还要每年再拿65万英镑退休金,而且要拿一辈子。我想人民很难理解。RBS的现任董事会主席也表示,两周前他就劝古德温自愿降退休金为好。

古德温不从,以复函形式表态,决不退钱。他还倒打一耙,说是当初决定退休金时,财政部官员并无异议,还谈此事“甚妥”,古德温不是什么善主。美国《时代》杂志评出金融危机25位罪魁祸首,古氏是其中之一。好大喜功的古德温有“世界最差银行家”的恶名。RBS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与其收购荷兰银行ABN AMRO有直接关系。正是在古德温主持和力推之下,2007年10月RBS收购了荷兰银行ABN AMRO。哪知事后发现,狡猾的荷兰人击鼓传花,把定时炸弹给了RBS,而英国政府又接了最后一棒。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政府向RBS投资200亿英镑,助其渡过难关。古德温也在2008



朱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兼职教授

年10月引咎辞职。古德温倒是认错了。今年2月10日,他与RBS前董事长双双到英国议会作证,诚恳道歉,承认收购荷兰银行是个错误,支付的收购价过高。古德温承认错误,但不肯退钱。而华尔街的金融高管既不退钱,也不承认错误。华尔街经常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但若是为了自保,还是死不认错为好。认错便为退钱打开了缺口。

从法律上说,追讨古德温的退休金比较容易,而要把华尔街的年终奖和离职报酬再拿回来,则难度较大。法律上,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古德温退休金由合同约定,少发或不发退休金是个合同纠纷。而华尔街的人很狡猾,巨款已一次性领回家中,成为其财产。这样,

追讨他们的年终奖,就成了剥夺他们的财产,难度很大。《美国宪法》规定,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生命和财产。“所谓正当程序”,主要是指,如有争议,最后须由法院定夺。当然,财产是可以剥夺的,只不过剥夺起来难度较大而已。如果华盛顿愿意向伦敦敦学习,从法律上说也是可为的。其实,历史上美国也并不是个爱财不爱命的民族。《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第一句话“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请看,并没有提到“财产”啊!很可惜,今天的许多美国人将“追求幸福”等同于“追求财富”。

就哲学指导思想来说,在追讨公司高官高薪酬的问题上,法国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的领头人。法国大革命前的激动人心口号是:“自由、博爱、平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法国金融家们拿钱时相对温柔些,没有英美同行那样丧心病狂。再就是萨科奇总统家事、国事不分,乱来

一气,道德权威就比较差,担当不起登高一呼,异军突起角色。换了已故总统密特朗,情况可能就不太一样。密特朗比较老辣,虽是万千风流,阅尽人间春色,包养情妇还有一私生女,但他不张扬,更不炒作,消息一出来,反成美谈。密特朗国内、国际一向受尊重,敢为人先。当然,密特朗是社会民主党人,而萨科奇是保守派领袖。他们在高薪酬上两种态度,这也是个原因。

不管如何,追讨高管薪酬由女王陛下的政府打响第一枪。英国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但好装神弄鬼,动不动以女王的名义、好像这就是替天行道了。古德温就从英国王室弄了个爵士头衔。英国政府的全称是“女王陛下政府”。当年鸦片战争,也是以“女王陛下政府”名义下的战书。但这次追讨金融高管薪酬,女王陛下政府终于做了件大好事,其意义不亚于牛顿定律的发现。

为追讨薪酬,英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很奋勇。英国议会金融委员会一位委员称,古德温退休金一事是“丑闻”,指责古太傲慢。英国央行的内则提出,当时决定退休金时,股东、董事会和金融媒体如何能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反对党保守党也是拍案而起,而且矛头直指了首相布朗。保守党一位议员声称:如果布朗当时允许古德温每年有65万英镑的退休金,那简直就是种耻辱。”布朗则赶紧表白,他知道退休金的事情没有几天,而且是一得知便立即下令采取行动。

但也有有人认为布朗是坏人。美国《时代》杂志列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布朗也在其中。布朗是个聪明人,也懂及经济,10年前在哈佛大学发表公开演讲时便预言,将爆发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但布朗在台上的时候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悲剧发生,布朗在任财政大臣期间,推波助澜,放松信贷管制,加剧房价疯长。布朗是不是好人并不重要,如果在资本市场这个地方坏人与坏人打起来,那是一件好事。

■相望江湖

为什么日本居酒屋如此之小——漫走在早稻田之二十二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在我的印象中,北京三里屯和后海酒吧、还有杭州西湖边的那些酒吧都是有相当规模,一到晚上热闹非凡,人气很旺。可我在东京闹市区看到的酒屋,却是另一番景象,那都是清一色的,最多也只能容纳十几人的小酒吧。我曾多次问日本朋友,为什么在日本所见的酒吧都是小酒吧,而且只能坐一两个小时就匆匆离开呢?但总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此次Nikko之行让我对这一问题突有了拨开云雾,茅塞顿开之感。原因可能还需从这个人多地少的岛国特性去找。这样的岛国,注定了日本人的房价会比其他陆地国家高得多。对日本人来说,那个疯狂的80年代,东京房价畸高,卖掉这个小小的岛国就盘下两个美国的土地。疯狂之后的日本人喊出那几声让美国人都为之提心吊胆的狂人狂语:“对美国说——买下美国的国土租给美国人居住”云云。其实,在这些狂妄之后,倒霉的还是日本老百姓。房价和土地价格不断飙升,随之而来的遗产税和不动产税也猛增,这对于那些小本经营面馆、居酒屋来说,是无力承担的。但面馆、居酒屋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场所仍然需要开下去。这时候,屋主或者原有的承租者只得将原本就不大的店面继续分割,直到不能再割为止。我们去过最小的酒吧,只能拥挤地坐下三个人。

为了使这些居酒屋和面馆能继续生存下去,老板必须加大顾客的流动性,以增加每天饭馆屋里的“吞吐量”。这就开始产生我们刚去日本时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到拉面馆吃饭,没到半个小时服务员就会来提醒你(实际是催促),这已是日本饭馆的惯例了。

曾有一次最疯狂的记录是,一天赶了四家酒屋的场子。从下午下班在

早稻田边上的居酒屋开始,再坐公交车到Shinjuku的酒吧,再坐地铁到Wajima家附近的东京郊区酒吧,然后又回到Shinjuku的那片酒屋。据日本朋友介绍,这片酒屋虽然还留下不少,但相对于当年他在早大读本科时已是萧条了很多。90年代以来的“失去的十年”已让这些居酒屋关门,倒闭的倒闭。当年早大那位风流情种村上春树逃课到这里来体验生活的那番热闹场景,早已不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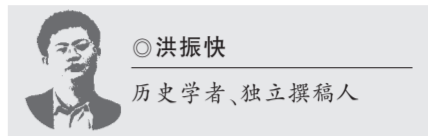
这一切,可能还是经济危机之前疯狂年代所造就的“土地神话”,再加上高昂的不动产税约束。

不妨举个简单例子:①假定工作了二十余年的W君用毕生积蓄购买了一套两层的房子,房价1亿日元。他把二楼作为住宿,再腾出一间租给别人,租金是每年50万日元,一楼租给别人做居酒屋之用,租金每年60万日元。那么,如果日本政府以1%的税率征收不动产税,当年他需要缴纳的税金是100万日元,从110万日元租金中扣除之后,还剩10万日元。这是W君当年的净租房收入。②时隔多年之后,W君的房子升值到1.5亿日元,他将一楼店面一割为二,租金依然是每年50万日元,那么租金收入为150万日元,而所需缴纳的税金也是150万日元,刚好持平。③更疯狂的涨价行为开始了,他的房子一夜之间涨到2亿日元,那么他每年不动产税就需要缴纳200万日元,而他租金所得却仍然只有150万日元,这使得W君当年账面上的收入是负50万日元。④此时,虽然房价仍可能上涨,即使我们不考虑Krugman多重均衡模型中的风险因素,W君仍有很强的动机去卖掉这套房子。

通过这一例子,我们能够大致明白增加不动产税对房产交易市场可能

■财经别裁

晚清上海大买办的一场地产噩梦



洪振快
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

国际金融危机远未见底,而国内房地产业是否会受金融危机影响,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也就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这种事情我们的历史上也发生过,时间也不算久远,就在120多年前的上海。

现在房地产商们最大的底气是住房的刚性需求,而最大的软肋则是资金链可能断裂。前者是房地产业繁荣的根基和利润的渊藪,而后者则是房地产商可能坏事的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晚清上海大房地产商徐润的兴衰成败,其命运的主线也正是由刚性需求和资金链断裂这两个房地产业的核心问题牵动着的。

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国人纷至沓来,在上海开办洋行(外贸公司),那个与林则徐唱对台戏的臭名昭著的大鸦片贩子颠地也在上海创设了一个洋行——宝顺洋行。洋行在中国做生意需要中国人帮忙打理,这些人被称为“买办”,所谓康白渡,徐润即是宝顺洋行的买办。也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买办。由于上海开埠后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东南地区尽被太平军攻占,唯有上海成为躲避战火的一个孤岛,江南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们,为了身家安全,纷纷带着财产涌入上海滩,上海因之迅速发展成为十里洋场销金地。

人口的暴增、商业的繁荣,形成了对房地产业的刚性需求。据统计,1843年上海开埠时仅有人口27万,1910年达到100多万。在沪洋人,1843年只有462人,1850年达1007人,1860年则有1400人。在这种情势下,上海房地产业获得了大发展的历史契机,有眼光的商人不难看出其中发财的机会。宝顺洋行大班(经理)韦伯曾告诉徐润:“上海市面此后必大”,对于外滩附近地段,“尔尽可有一文置一文”。徐润抓住机会,大量购进土地。到了1883年,他囤积的土地已达到3200余亩,已成为当时上海滩的“地产大王”。但是,接下来的开发资金问题,却让徐润遭遇滑铁卢。

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利用自己的资金,徐润仅开发了320余亩地,仅占土地总量的约十分之一,而其他2900多亩土地缺乏开发资金,因此融资成了徐润的头等重大事。

徐润准备成立一家大房地产公司,以招股的形式筹集社会资金,共拟招股400万两银子,每股本银10两,先收股本200万两。另外,他和一个英国朋友商定,这位朋友回英国为其筹集资金200万两。但是,这两个筹集资金的方案都落了空,股本既没有招到,英国朋友也黄鹤一去不复返。不过,徐润能量不小,他经营茶叶等生意非常成功,在上海金融界信誉卓著,经多方奔走,他还是从钱庄等处筹集到社会资金252万两。

正在徐润准备打造一个房地产帝国的时候,1883年发生了金融危机,银根吃紧,全国各地钱庄都发生了倒账风潮,不少钱庄因此倒闭,这中间包括胡雪岩鼎鼎大名的阜康钱庄。加之,此时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开到了吴淞口,并扬言要进攻上海,市面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少人逃离上海,根本没有兴趣买房租房。这时候,各钱庄草木皆兵,与徐润有资金往来的22家钱庄联合起来一起向他催讨借款,徐润的资金链彻底断裂,除了贱卖资产清账抵债之外已别无他法。万般无奈之下,徐润将包括已建房产在内价值340多万两银子的产业全部贱价脱手,充抵200余万两的借款,还未投资兴建的2900余亩土地也以100余万两银子的低价卖出。就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大房地产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破产了。资金是房地产开发的关键,徐润的失败,败在野心太大,所需资金太多,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房地产帝国立刻崩溃。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是否会重蹈徐润当年的覆辙?徐润当年经营房地产,土地买卖、资金筹集等等都纯粹是市场行为,政府并不干涉,更无利害关系。但当下土地属于国家,供应量受到有力控制,而地方政府倚赖土地出让金维持财政平衡的状况也是众所周知,所以为了银行和金融安全及“土地财政”的需要,政府并不希望房地产业特别是大房地产商破产。但是,假如购房者继续观望,房产商无法回笼资金,那么破产倒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今后中国房地产业的走向,将取决于购房者、房产商、政府三方面的博弈。至于金融危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不是主要的。